

1949年6月起,县局利用丰惠南街当铺原国民党上虞地方法院的监房羁押人犯。1950年5月县人民法院建立后,利用节孝祠原国民党警察局的拘留所关押人犯。1951年5月,看守所统一由县局管理,当时丰惠的节孝祠、当铺、观察第等3处共有木笼式监房23间,看守所办公室设于节孝祠。

1954年秋,看守所随县局迁至百官镇槐花桥边(今解放街150号),为新建木结构监房。1958年曾在大夫第(今党校校址)增辟过一处临时羁押场所,不久即撤销。1966年,在槐花桥监所原址改建成砖混结构监房及办公用房270平方米,警戒、生活等条件有所改善。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也为改变看守所紧靠街道和民房的弊端,1974年9月动工,在镇北孔山(即今青春路62号)新建看守所,1976年7月竣工。共投资11.6万余元,其中省厅拨款6万元,建造监房及管理用房1202平方米,砖混结构,四周高墙坚固,院内植树绿化,有宽敞的放风场地,监室内光线充足,配有卫生设备。

1982年4月,县局在槐花桥看守所旧址正式建立收容审查站,由刑侦队兼管。1983年8月起曾在上浦闸增设收审点,次年底撤销。1984年12月,投资7万元,在孔山边建成行政拘留所,包括办公用房总面积1289平方米。1985年后因规定县级不设收审站,收审对象改由行政拘留所看管。1986年7月由行拘所移交看守所看管。

第二节 武装看押

1945年1月,抗日民主政权上虞县办事处在警卫队下设一个看守班,负责看押人犯,当时无固定监所,随“县办”流动游击,至“北撤”中止。

1949年5月22日上虞解放后由虞东区武工队看押人犯。6

月，上虞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建立后，从虞东区武工队抽调一个班警戒监所、押解人犯。当时无看守人员，对人犯的管教亦由武装人员负责。7月，看守所配看守员，武装人员不再兼管对人犯的管教。当时刚刚解放，生活艰苦，个别武装人员被人犯腐蚀拉拢，8月，发生著匪王富定等4犯带镣越狱逃跑得逞的严重事件。次年4月，又发现以公安队班长汪桂灿为首的密谋暴动案件。汪犯自上年10月以来煽动拉拢公安队、县大队、县委交通班部分武装人员，与王富定匪部勾结，伺机劫狱放囚进行武装暴动。幸发现及时，其阴谋未能得逞。

1950年10月镇反运动开始后，人犯数量激增，关押人犯的场所多时增加到6~7处，看押任务繁重。公安队战士24小时分头轮流执勤，干部加强夜间带班查哨，检查落实防范措施，确保了看押任务的完成。1951年3月20日晚，公安队押解21名将于次日处决的死刑犯在崧厦区政府临时关押，一匪犯诈称盖被，乘看押战士走近之机，突然夺取枪支向战士射击后逃跑，被其他战士击毙。另一匪犯乘混乱之机脱逃，后被捕回。

镇反运动结束后人犯减少，看押任务趋于平稳。1958年6月开始，人犯收押管教复由负责看押的武装人员兼管，直到1960年冬始再配看守干部。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经常组织部分人犯参加诸如修路、开荒、抢收抢种等劳动，均圆满完成了劳动中的看押任务。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监所规章制度遭破坏，出现了看守人员与武装人员职责不清，及对人犯发生违反政策的现象。直至1973年县局恢复后才逐步得到纠正。1975年5、6月间，为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对敌斗争，县局选择11名典型案犯在全县范围内巡回游斗，看押武装圆满完成了游斗过程中的看押任务。

1983年8月“严打”开始后增设了上浦闸收审点，由武警和

民兵共同负责看押警戒。次年夏天，县武警中队被绍兴市武警支队评为“暑期百日无事故单位”。

1985年11月13日晚6时许，由于武警哨兵思想麻痹，3名收审人员破窗越墙逃跑。同年12月8日，武警中队副班长何××，执勤时利用掌握行拘所监房钥匙的机会，奸淫被收审的女流窜犯，事后何被遣送回家。武警中队吸取2次事故的教训，开展了教育整顿，树立以执勤为中心的思想，工作有了起色。

1987年在繁重的军训任务中进一步做到一切为执勤服务的思想不动摇，干部对执勤的领导管理不放松，执勤的兵力配备不减弱，圆满完成了看押任务。1989年8~11月，武警中队配合看守所百日安全竞赛活动，被评为绍兴市红旗单位。1989年底执行省厅通知，看守所实行武装警戒“内转外”，进一步明确了武警中队与看守干部的职责，哨兵一律在看守巡逻道上流动警戒，不直接参与对人犯的管教事务。1990年圆满完成看押任务，未发生事故。

第三节 人犯管教

县局看守所自建立之日起，即遵循党的有关政策，对人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把教育、感化、挽救人犯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1950年开始订购有关书籍、报纸供人犯阅读，使人犯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政策。建立了洗晒衣被、放风、供应开水等制度，给人犯吃足规定的饮食标准，吃熟、吃热、吃得卫生。对认罪服法、努力改造、诚心悔过的人犯从宽处理，有立功表现的人犯给予奖励。是年春，在押的原国民党上虞县长吴驰湘揭发了卫兵勾结犯人企图暴动而立功，经报请绍兴专署公安处批准，于8月15日交保释放。镇反运动开始后，关押的人犯数量骤增，看守人员工作量增大，连休息时间也难以保证，正常的管教秩序亦受到